



## 鲁迅、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 ——“悬想”与“神思”

□王德威，哈佛大学讲座教授，台湾“中研院”院士

五四运动以1917年胡适、陈独秀等所号召的“文学革命”为肇始点。由文学所承载的批判性及创造力，成为启动、支撑革命想象和实践最重要的资源。汉娜·阿伦特曾有名言：革命的意义无他，即在于引发人同此心，共创新猷的感染力。这一革命性的感染力见之于“五四”，就是文学。“文学”不再仅限于学院规划的纸上文章，或文学史所罗列的大师经典，而是一种应答并改变世界的方法，一种石破天惊的活力，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。环顾“五四”百年后的文学及文学研究，早已经驯化为文化建构的一环。学院论述谨守分际，曰启蒙、曰革命，却无不似曾相识。但这样的现象不必意味“文学革命”到此告一段落，反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“五四”文学的论述与实践的复杂面相。我们必须挖掘“文学革命”所曾具有的潜能，以及被遮蔽的过程。

本文借由鲁迅文论的两项观念——“悬想”与“神思”，探索“五四”文学意涵，以及当代的回应。这两项观念都强调“想象力的政治”：敷衍人生边际的奇诡想象，深入现实尽头的无物之阵，探勘理性以外的幽暗渊源。现当代文学主流论述以写实/现实主义挂帅，“神思”与“悬想”一向隐而不彰。但是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异军突起，提醒我们文学革命中这些被湮没的观念。这不尽是历史的偶然。在20世纪初，鲁迅的文学事业即以翻译、改写科幻小说开始。而他的早期文论也不断思索科学与文学的分野。

《狂人日记》发表一百年后，韩松出版“医院三部曲”（《医院》《驱魔》《亡灵》），为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科幻小说热潮再添力作。韩松的作品阴郁诡谲，充满了强烈的末世隐喻。《狂人日记》与《医院三部曲》各据百年“五四”一端，形式极其不同，但都触及“神思”与“悬想”的多重维度，并展开隐秘对话，如科学与文学、身体与国体、疯狂与理性、疾病与医药、入魔与除魅。更重要的是，两位作家都借此叩问书写与文学的根本意义及革命性真谛。

### 神思、悬想与圣觉

1907—1908年，鲁迅在日本写出《人之历史》《摩罗诗力说》《科学史教篇》《文化偏至论》等系列文章，思考维新知识分子面对西学冲击的因应之道。《摩罗诗力说》更进一步指出文学介入“人间情况”的枢纽意义。鲁迅强调“别求新声于异邦”。这样的新声非摩罗诗人莫属。摩罗诗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于“攫人心”。摩罗诗人虽然来自异邦，鲁迅却将其谱系嫁接到中国传统，并以“新神思宗”作为命名。“神思”源出《文心雕龙》，所谓“文之思也，其神远矣，思理为妙，神与物游”。但鲁迅的用法则与欧西浪漫主义挂钩，他心目中的摩罗诗人挣脱温柔委婉的“情”“志”传统，而淹然有郁愤之情，叛逆之志。相对于传统诗学的思无邪，鲁迅的“神思”极致处是“思有邪”。换句话说，新“神思”成为一种时代反抗精神的体现。相对兴观群怨，鲁迅要发出“真的恶声”。另一方面，鲁迅又在古希腊文化中发现“神思”的另一源头——神话。《摩罗诗力说》写到“古民神思，接天然之闾宫，冥契万有，与之灵会”。文学的不用之用于“涵养人之神思”。《科学史教篇》肯定希腊“思理之士”“研索天然”，不仅发现科学的“真源”，也同样见证“神话”

的勃兴。也因此，在《破恶声论》里有了“伪士当去，迷信可存”的名言。

鲁迅以如此定义的“神思”来推动文学，内里的张力可想而知——而这也正是鲁迅文论的革命性所在。鲁迅晚年又提出“悬想”，缘起他对朱光潜治学方法的批判。在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（六至九）》系列杂文里，他讽刺朱断章取义，无视文本内外互涉的复杂关系。鲁迅讽刺当代“伪士”沉湎于历史层层斑驳积淀，殊不知倒果为因，反而失去体察历史本真面目及其物质性的能力：“例如，希腊雕刻罢，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‘只剩一味淳朴’者，原因之一，是在曾埋土中，或久经风雨，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，雕造的当时，一定是崭新、雪白，而且发闪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，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‘美’，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。”

如同“神思”“悬想”也是古语，意为挂念，又指揣测，猜想。而在近代，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则强调悬想的凭空想象意义。鲁迅的解释更为复杂，因为他希望“悬想”所达到的，不是凭空捏造，而是历史真相的探究。换句话说，“悬想”反而拂拭了历史的积垢，还原历久而弥新的本色。而这一过程与其说是依靠知识分子的评头论足、上下考证，还不如说是有赖下里巴人无视历史的天真，对事物、对生活本当如此好奇。“悬想”一词让我们联想鲁迅所作《科学史教篇》里另一类似关键词——“悬拟”（hypothesis）。在文中，鲁迅虽然肯定科学的重要，但不以经验主义，以及缘由内籀（归纳）法形成的实证科学为然。鲁迅提出“悬拟”作为调和，而“悬拟”关乎假设与想象，不仅如此，鲁迅文中对“悬拟”的把握是透过赫胥黎的“divine afflatus”一词，并译为“圣觉”。

在鲁迅的视野里，“神思”神游物外，以匪夷之所思引领叛逆想象；“悬想”出虚入实，搁置视为当然的成见，重新发掘事物的真相。两者都强调历史当下的无明与因循，无法以理所当然的科学启蒙来解脱，而必须涉及想象力的介入，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演绎人与世界的密切关系。这一介入的方法付诸实践，就是“文学”。

## 科学、玄学与“悬学”

鲁迅以“悬想”与“神思”发展出的文学观在“五四”时期及以后并没有受到重视。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强调写实/现实主义，以文学作为反映世界，针砭人生的法宝。蕴于其下的科学语境不言而喻。学者从史华慈到郭颖颐等早已指出早期现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。当科学被无限上纲为解释并实践现代性的唯一法门时，其内容或实践的得失如何反而无关紧要。

唯科学主义论述在“五四”之后引起种种反思，以 1923—1924 年科学与玄学（或科学与人生观）论战最为受到瞩目。论战最激烈处，丁文江直指张君勱及其从者为“玄学鬼”。与此同时，左翼知识分子如陈独秀、瞿秋白、邓中夏等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唯物史观批判。

林毓生先生讨论“科学与玄学”论战时指出，尽管这两派壁垒分明，但却享有共同的立场：他们都承袭了“五四”奉“思想文化”为解决问题的全权方法。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泾渭分明，却都自认据有绝对正当性及合理性。尤有甚者，他们所根据的论述逻辑基本都是唯科学主义奉行不疑的归纳法。林毓生反问，在主观和客观、直觉和方法之间设下不可逾越的红线，他们果然能够将心目中的“科学/玄学”贯彻始终吗？假设、拟想和想象仍是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鲁迅早年弃医从文，对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思考已触及日后科玄论战中许多议题。如果文学曾是“五四”最受瞩目的论题之一，论战中文学的缺席，就更值得思考。“五四”推动文学改良和革命的两员大将——胡适和陈独秀，在论战中各据科玄一方，发表高论，但他们所论却与文学丝



毫无关系。鲁迅的沉默，陈独秀和胡适的移转阵地，恰恰点出了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尴尬位置。

不论科学、玄学派，以及陈独秀所代表的唯物派，其实都是以“思想文化”为前提，作为解决中国危机的方法，却从未对其载体——语言、修辞、论述——有过任何怀疑。而就在论战的几年以前，他们所使用的白话文才因为胡适、陈独秀的鼓吹获得前所未有的注意。“五四”先锋们视白话文为“科学”而“民主”的透明工具。而在文学表征上，写实/现实主义小说被认为是直捣事物真相的重要发明。鲁迅未尝不支持文字与文学革命，却早早看出其中问题。就在多数同行欣然运用白话文、新文学描摹社会、号召革命时，鲁迅意识到“文学”本身一方面被无限上纲，一方面却已经被视为当然，有若“无物”，而所谓的革命性已经成为工具化的借口。

鲁迅没有直接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，但他以文学的形式回应了论战的僵局。这包括了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中诸多小说试验，《野草》等奇诡的散文诗歌，以及数量庞大的杂文。潘多拉的盒子既然打开，就无从保证结果。鲁迅何尝脱离他的科学训练，但他对事物的观察和设想如此“无微不至”，以致漫漶出丁文江式“归纳”法逻辑和幅度之外，暴露最散漫的生命物质性。他对玄学家所透射的彼岸世界其实好奇不已，但上下求索的“天问”反而逼出了更黑暗、更玄秘的所在。

这是鲁迅的文学革命。其革命性不仅在于亦步亦趋地反映人生，也在于直面人生晦涩的、难以穿透的物质性；不仅在于改变现状，也在于认知现状深处、无限“俱分进化”的动机。套用科玄论战的话语，科学必以“神思”和“圣觉”为前提，而玄学不能自外“悬拟”和“悬想”。任何斩钉截铁的试验必须有假说和想象的介入，任何理所当然的“人生观”必须在历史与虚构交织的脉络中，反复接受检验。然而鲁迅的想法较此尤为复杂。他的“神思”飞扬蹈厉，却终究弥漫鬼气；他的“悬想”无论如何要跳脱事物和思想的窠臼，总似乎难以避免恶性循环。文学因此是科学与玄学之间黏滞飘忽，不能摆脱却也不能或缺的界面——“中间物”。这恰恰是号称一了百了的科学方法或玄学人生观所难以解决的。而“中间物”导向了更激进暧昧的“无物之阵”。

从“立人”的观点来看待鲁迅的“无物”，鲁迅的述作的确充满无所不在的虚无与惶惑。我们只能以“否定的辩证法”来证实他对生命和现实的关心。但与此同时，鲁迅已经一再暗示，跳脱“立人”的框架，文学革命者所探索的“物”的终末有无，才更摄人心魄——鲁迅是叩问一个科学与玄学以外的更广袤的世界。在这一层次上，“神思”和“悬想”所指向的虚无，也可以是来自无尽“虚”“有”的邀请。“于天上看见深渊，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。”文学主体是否要跨过理性或人生观最后一道防线，成为文学最大的挑战。以此，鲁迅的“悬学”呼之欲出。

## 还是“在医院中”

“五四”文学革命之后的一百年，中国文学历经起落，基本仍奉鲁迅为宗师。但承续以上的论述，鲁迅文论中“悬想”与“神思”的面向，其实没有受到重视。文学史论述及一般批评所强调的，不脱大师感时忧国的块垒，或批判现实的精神。时至今日，以文学反映人生，改造民心士气的说法依然是主流论述，写实/现实主义叙事也依然是写作的大宗。

但在新世纪文学的开端，我们见证“五四”正统文学论述和实践疲态毕露。各种传媒的兴起尤其加速了文学市场的式微——虽然“文学”作为“群治”资本的潜力未尝消减。当此之际，科幻小说异军突起，十余年内引起全球读者的热烈追捧，不能不说是新时代文学最值得重视的现象。

21世纪的科幻热潮并非前所未见，早在20世纪的开端已经有一次科幻小说勃兴现象。梁启

超提倡“新小说”，心目中的理想文类就是科幻。而在本文的范畴里，所可注意的是晚清那场科幻热潮中鲁迅的角色。这段时间正是鲁迅思辨“悬拟”“神思”“圣觉”的时期。1903年，当鲁迅翻译儒勒·凡尔纳（Jules Verne）的科幻小说《月界旅行》和《地底旅行》时就提出他对乌托邦的想象。1905年，鲁迅译作《造人术》，想象“人芽”的生成，用以改造人种，更新国民。学者严锋、宋明炜都指出《狂人日记》透露科幻小说的痕迹。

一个世纪后，鲁迅和晚清民初一代作者的科幻试验再度吸引读者。我们不禁要问，科幻文学在新世纪卷土重来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“悬想”与“神思”又能发挥什么新的动力？在韩松看来，病、医与药不只关乎厚生保健或“生命政治”，而根本就是人的生存本质。人人有病，人人治病，医与病、死与生不断轮回，谁也不能出院。而作为三部曲的终结篇，《亡灵》构建了复活之日火星医院的“大同社会”，“药帝国”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命“原死”就是“元死”。

韩松有意识地向大师百年以前的感叹致意。鲁迅立志习医的经过我们耳熟能详。1906年幻灯片事件以后，鲁迅弃医从文，而他的逻辑仍然是医治身与心之别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。”

病、医疗与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。鲁迅之后，沉痾重症蔓延作家笔下，被浪漫化、道德化、政治化、寓言化。在这一脉络里，韩松的“医院三部曲”又做了大跃进：宇宙即医院里，人人生病而平等。医院的目的是治病救人，而是不断发现疑难杂症，百般治疗，让病人死去活来，继续住院。韩松曾经说“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科幻”。的确，文学反映人生那套公式已是强弩之末，不足以刻画当下光怪陆离的现实于万一。更有意义的是，韩松的写作不啻回应了鲁迅当年的“悬想”与“神思”。“悬想”让韩松跳脱叙事现状，审视医院运作的环节，竟然有了超现实况味，“神思”更驱使他将医院带向宇宙太空，从而投射后人类思考。有心读者不难发现与鲁迅对话的巧思。末法时代的医院是个没有阻拦、却无所逃遁的“铁屋子”。而当病人和医生陷入重重互为主客——或互为主奴——的幻境里，那是“药时代”的“无物之阵”。

但韩松与鲁迅的对话不止于此。“悬想”与“神思”也不必仅作为社会或历史批判的方法。借助庞大的医院神话，韩松其实重启早期鲁迅对科学与文学的批判性思考。但韩松心目中的文学不再像青年鲁迅设想那般能够直指生命原相——而是“元”文学的不断自我指涉与解构。事实上，鲁迅作品从来内蕴极大的紧张性。摩罗诗人的“恶声”既能攫人之心，也能让人自啮其心。

回到本文开始的提问，鲁迅面对“五四”之后的科学玄学论战，可能的回应是什么？鲁迅当时保持沉默。而百年以后韩松再次提醒我们，鲁迅的志业是“悬想”，是“神思”，是文学。面对人所创造与被创造的生命诸多难题，文学以相生相斥的晦涩与清明，同成为病灶与解药。悬想跨越虚实，神思无中生有，两者都根植于历史内外的无物之阵，指向解放的可能，也沉思其不可能。科学与玄学派不会满意这样模棱两可的定义。但文学的革命性及其自啮其身的反噬性恰恰展现其中。

联想到“医院三部曲”的开端：亘古永夜的太空中，三名僧人驾驶“孔雀明王”号太空船航向火星，他们寻找佛陀，看见医院。经过多少劫毁，三部曲的结尾，火星医院出现一位女性，她来探究真相，却陷入迷阵。她最后的希望系于救援濒死的儿子——救救孩子。但真相可能就是幻相。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，鲁迅曾如此默想。辗转其间，文学作者一如既往，他们知道那是一场未完的、永远不完的文化革命。

编辑 张 蕾 特约编辑 李秋祺 黄若娛

